

# Views o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Cultural Origin, China's Reform Goals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Xing Ao Yuantai Xi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5, China

## Abstract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have been considered “impossible to have both”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fter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our society have been transformed, the views o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dealing with reform and development must also change accordingly.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the new crown epidemic situation,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re more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his paper begins by historically observing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o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at has been considered “both incompatibl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Next, it is stated that the consideration of both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s the goal requirement of the reform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y requires both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require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requires “efficiency first”,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socialism require “both fairness”, so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s a requirement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Finally,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scientifically coordinating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s summarized: first,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system guarantee that balances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nd second, firm and stro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strong economic backings that balanc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The third is to expand the proportion of middle-income people, eliminating poverty is a balanced economic measure, and the fourth is to support,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s is a balanced social measure.

## Keywords

views o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cultural origin; reform goals; China's experience

# 公平与效率观：文化渊源、中国改革目标与成功经验

敖星 谢元态\*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江西南昌 330045

## 摘要

公平与效率千百年来被认为“二者不可兼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公平与效率观也必须随之变化。面对新冠疫情的国际态势，公平与效率观的变化更显重要和必要。论文首先历史地观照中西方学者论公平与效率及其千百年来被认为“二者不可兼得”关系的文化渊源。接着阐述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既要效率也要公平；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效率优先”，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求“兼顾公平”，因而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最后总结科学协调公平与效率成功实践的中国经验：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保障，二是坚定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强大经济后盾，三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消灭贫困人口是兼顾公平的经济性措施，四是扶持、推动和完善公益组织的发展是兼顾公平的社会性措施。

## 关键词

公平与效率观；文化渊源；改革目标；中国经验

## 1 引言

1992年中国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反映在个人收入分配上。但是，公平与效率千百年来被认为“二者不可兼得”，往往都是以牺牲对方为代价的——在聚焦重心在“效率”的阶段对“公平”

关注较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被确立的二十多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1]</sup>进入新时代的不平衡，既有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也有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既有产业与行业之间的不平衡，也有不同单位与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衡；既有经济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也

有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方面结构的不平衡。如此种种的不平衡，换言之就是“不公平”。这种种的“不公平”，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与文化原因。百姓在“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的过程中，必然会越来越关心社会的“公平性”，而“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习近平语 2017）<sup>[1]</sup>。因此，专题深入研究“公平与效率观”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课题。

## 2 文化渊源：中西方学者论公平与效率及其关系

### 2.1 中西方学者论公平

中国古代许多学者都有对公平的论述。孔子就有提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税收思想。对于社会的不公，他主张用仁义礼乐来解决。孟子提出人先天平而后天不平等的观念，认为人先天都有“四心”——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但后天人是因思想觉悟不同，就出现了差别。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对两千多年前西汉发生的一起关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争论与博弈全过程进行了客观的记录和描述。中国历代文人“天下大同”思想都是对公平社会的理想追求，而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均平富”则是追求公平的激烈的群体行为。当代学者郭书田和刘纯彬等在《失衡的中国》书中，运用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分析了中国城乡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并列出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十四项城乡分割制度，致使只有占 20% 的市民与占 80% 的广大农民之间形成了极不公平的二元经济结构，甚至在市民和农民内部也形成了不同的阶层<sup>[2]</sup>。孙立平在《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一书中描绘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失衡现象，提出“贫富失衡—利益失衡—权利失衡”社会运作不公平的逻辑<sup>[3]</sup>。李实和岳希明在《〈21 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一书中将《21 世纪资本论》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指出中国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不公平），并试图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可行性建议<sup>[4]</sup>。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 E·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

的代价》中写到，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是不公平的，使得生活在那些国家的普通人感到不满，从而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稳定<sup>[5]</sup>。托马斯·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论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对 18 世纪至今的收入数据进行分析，论证了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财富分配不均<sup>[6]</sup>。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公平优先”论，对公平正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sup>[7]</sup>。他提出“平等自由的原则、机会公正平等的原则和差别原则”，试图调节社会基本结构，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均等享有各项权利和义务。

### 2.2 中西方学者论效率

管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梁启超语）、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他的治国理财之道充满了效率思想。在管仲相齐的四十年里，他对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如管子认为要调动全民的效率，就要充分照顾到人所共有“自利”的情节，但又不可走向极端。又如管子治理国家经济的基本原则，“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取之无形，予之有形”“寓税于价”“见子之形，不见夺之理”的理财方法——实际是一种巧妙的间接税制的办法、“贫富有度”并巧妙制止贫富分化，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以及“以食盐为工具，谋取天下之财”等，以人民乐于接受的方式高效率地使齐国国力大盛<sup>[8]</sup>。当代中国学者郭威（2018）认为，效率观具有微观性和宏观性，其表现在个别资本家提升生产技术，从而提高了工人劳动生产率，进而产生超额剩余价值；在市场竞争中，其他资本家也会随之提升生产技术，超额剩余价值逐渐转化成相对剩余价值<sup>[9]</sup>。卫兴华先生（2013）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效率优先”论是不可取的，并提出了六点理由来论证这种提法的不科学性；他提出中国不能以西方自由学派的“效率优先”论来处理中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中国应同等重视效率与公平<sup>[10]</sup>。

在西方经济学家中，以科斯、罗宾斯、哈耶克和费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效率优先”。科斯认为，只要产权是明晰的，并且在交易成本在极小或者为零的情况下，不论产权如何界定，自由竞争的市场均衡最终结果都会是帕累托最优状态。他们认为，自由竞争是实现高效率的前提，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而去破坏自由竞争市场的运作机制，会降低效率，使一部分的人收益受影响。哈耶斯认为，政府

**【作者简介】**敖星（1997-），男，中国江西樟树人，中国江西农业大学 2019 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邮箱：935054886@qq.com。

**谢元杰\***（1955-），男，中国江西上犹人，中国江西农业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论》与转型经济。邮箱：xyuantai@126.com。

通过采取一些政策和法律手段来干预市场的运行,从而来调节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从来就不是公平的”<sup>[11]</sup>。以加尔布雷斯、博尔丁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认为,市场本身的运行是低效率的。要想将效率提高,政府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他们还主张国家应当进行财政拨款,保证各部门之间协调的、高效率的运转,从而保证社会利益。

### 2.3 公平与效率千百年来被认为“二者不可兼得”

自古以来,公平和效率就被看作是“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的发展在明清时达到顶峰。这种制度从某种层面来说是有效率的,由于存在中央集权制度,君主的政令可以从上至下统一的传达,相关的政策可以很好的实施,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在国家发生灾难或者要修建大型工程时,可以很快的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应对。但是,这种制度存在着很大的不公,因为中央集权制度,中央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识来征收赋税徭役,使得百姓只能逆来顺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公平与效率的不平衡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古代,在上世纪50年代,“大锅饭”现象在中国出现,体现了极端的平均主义问题。在当时,企业不管盈利还是亏损,企业的工资照发;个人工作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都不影响个人的工资。极端的平均主义使得每个人对工作都丧失了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导致社会发展效率低下,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

公平与效率不平衡的问题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中也存在。美国过度强调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虽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其不平等程度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前的,贫富差距的过大使得许多劳动人民陷入贫困之中,造成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瑞典的情况与美国正好相反,瑞典政府过于强调公平,国民的社会福利过多,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从而导致“瑞典病”的发生。

## 3 兼顾公平与效率: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

### 3.1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都要求公平与效率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领导人都在探索在经济的发展中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从而使国家更好的发展。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平与效率的理论,结合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重

公平,以公平促效率”的公平效率观,具体表现在平均分配土地和社会主义改造上。平均分配土地就是将当时地主土豪和富农的土地没收,再将没收来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没有土地的人民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千百年来,受剥削的人民群众在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之后,劳动的积极性显著提高,从而粮食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毛泽东主席认为,从古至今人民群众之所以受到剥削就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废除这种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从而调动各界人民群众的工作热情,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随着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其弊端也慢慢体现出来,主要表现为极端的平均主义,大家干多干少都一样,人民对劳动失去热情,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在中国拉开帷幕,邓小平同志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以此打破极端的平均主义。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就是硬道理”,而效率才能带动发展,只有把效率居于首位,才能带动人民工作积极性,完成经济的腾飞。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让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公平,他提出“允许一些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人民的全部富裕”<sup>[12]</sup>。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到:“我们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sup>[1]</sup>。”这意味着,中国公平与效率观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更有效率、更加公平”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经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具体表现在人民群众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较大等问题上。中国为了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应深化改革经济结构,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从而更有效率的发展,并且应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减人民群众收入差距,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在高效率和相对高公平的情况下,才能有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 3.2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

#### 3.2.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效率优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到21世纪中期这一个时期。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首次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发展不发达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农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较大,主要依靠手工进行劳动而不是依靠机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所占比重较大;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全国很大一部分人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人民生活水平较低,每天需要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温饱而奔波,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当人民在温饱问题上都难以解决的时候,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就更加乏力;城市与乡村之间和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和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很大;在这个时期,国家刚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这个经济体制还比较稚嫩,存在着许多的漏洞,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因此,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sup>[13]</sup>。”“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要把经济效率提高,不能像计划经济后期一味强调公平,搞成极端的平均主义,邓小平同志认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是荒谬的<sup>[13]</sup>”。当然,我们不可否认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中国的贡献,首先计划经济体制帮助中国在建国初期解决了旧中国时期留下的经济问题,顺利渡过了经济困难时期;其次当时中国物质资源匮乏、资金短缺,运用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可以集中现有的资源进行重点项目的建设,建立起了基本的工业体系;再次,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了中国基本福利制度,百姓的生活问题初步得到解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让经济平稳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在这一体制下经济生产的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都得依靠政府的安排。企业不能自主经营,不能根据市场的供求来合理分配资源,只能服从计划的安排,只要不服从企业负责人便会被问责;消费者也不能随意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得凭借相应的票证来买东西。可想而知,这种经济体制是低效率的,要改变这种情况提高效率,就需要放活微观主体,让企业拥有相对独立,可以自主决定经济生产的三个基本问题,在市场调节的作用下,使得资源能够流向更有效率的部门,使得资源配置更加的有效率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还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位置,聚焦重心在“效率”,而“公平”关注较少,虽然现在对“公平”的关注变多但相对于“效率”还是不足,从而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逐渐加大。

### 3.2.2 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求“兼顾公平”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提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14]</sup>”,这体现了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的思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讲到,“要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通过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合理降低政府和企业收入比重。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sup>[15]</sup>。”

社会要实现公平的发展,就得缩小人民群众的收入差距,健全再分配调节制度,在现阶段,中国在这方面具体表现在精准扶贫上。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的消除贫困,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调研时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开始,“精准扶贫”工作就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末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可见“精准扶贫”是一项伟大的工作,它缩小了人均收入差距,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了百姓的福利水平,展现了中国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仅更有效率而且更加的公平。

从整体上看,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一些地方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不足,只有将这些不足之处加以改进,中国的发展才能更进一步。

### 3.2.3 本质特征:社会主义要求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

在面对公平与效率这对范畴时不能顾此失彼,如果一味地夸大公平而轻视效率,就会走极端平均主义的老路,只能成为贫穷的社会主义;如果一味地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一开始经济或许能快速发展,随着收入差距的慢慢加大,中等收入和低等收入人群就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理,会产生潜在的危害,不利于社会稳定,反过来影响效率自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中国的发展应该将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既要更有效率也要更加公平。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sup>[6]</sup>。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sup>[1]</sup>”。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基于深刻总结、分析国际发展经验教训和发展大势提出的,体现了中国发展的思路、方向、着力点。五大发展理念不仅强调了公平还强调了效率,是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很好的表现,其中创新、绿色和开放强调了发展的效率,协调和共享强调了发展的公平。创新是排在五大发展理念的第一位,是发展的首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创新对中国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目前中国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在一些高端制造业比如芯片制造业、发动机制造业等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所以中国共产党把创新发展理念放在重中之重,并且相继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等,占领创新高地,建设创新型国家。绿色是发展的必备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sup>[1]</sup>。绿色发展的理念是针对中国传统发展理念提出的,传统理念是一种粗犷的发展理念,只顾GDP的增长而不管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随着中国污染严重,全国各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雾霾天气,资源被肆意开采,造成生态环境恶劣,绿色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只有转换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国家,才能使人与自然相处和睦。开放是顺应全球化的趋势,中国能够有现在的发展成绩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所以必须毫不动摇走开放发展的道路。与美国在国际上疯狂“退群”不同,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设立就是很好的体现。协调是针对中国现阶段发展不平衡提出的,一直以来中国就存在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大等问题,为了防止社会矛盾的加深和潜在危险的发生,我们不能只顾着经济能发展多快,还必须调整发展关系,加大发展的整体性。共享就是让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蛋糕”越大,这个“蛋糕”也得切好,只有群众的要求得到满足,人民的积极性就会被激发出来,才愿意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的集合体,不仅体现了对效率的要求,“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还体现了对公平的要求,

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将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更好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早日实现中国梦。

## 4 实践经验:中国处理公平与效率的成功做法

### 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理论成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高效率地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又实现了全民共享、相对公平的社会福利。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较好的处理了在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这对范畴。市场经济强调效率,主张通过市场来调节经济,得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社会主义强调公平,而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又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导力量,政府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协调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因而,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是解决公平与效率的中国方案<sup>[17]</sup>,具有调节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内在机制。在2020年国务院最新颁布的《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通过健全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措施来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和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提质增效等措施来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使得社会经济的运转更具有效率。

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战斗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保障被再次被印证。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了多起不明原因肺炎患者,12月30日国家就派遣卫健委专家前往武汉进行相关检测工作。在查明原因后,防止疫情在全国扩散,为了全国人民的健康安全,不惜以牺牲武汉市的经济发展为代价,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对比其他某些西方国家奉行“群体免疫”政策,轻症患者自行居家隔离治疗,不符合住院条件的老人送回老人疗养院等防疫措施,在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于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一定要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让全国患者都能得到及时的、有效的救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公

平性体现的淋漓尽致。此次新冠疫情的抗战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效率性也被很好的体现，发生了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从荒芜人烟的空地到占地 34000 平方米拥有 1000 个床位的传染病医院——火神山医院，中国只花了十天的时间就建成，这个建设速度是其它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为了缓解武汉各家医院的压力，16 家用于收治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也在短时间内迅速建成并投入使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评价中国防治疫情的工作中说道：“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 4.2 坚定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强大经济后盾

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进一步强调了国有企业的重要性，提出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政治基础，是事关国计民生、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坚力量，不同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其它所有制的企业，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和政治的顶梁柱，因此国有企业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强大经济后盾。国有企业还是强大的国家实体经济，只有将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才能使中国整个实体经济有更好的发展。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全盘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要考虑我们本国国情，让国有资本不仅参股还必须控股战略性和支柱性的产业及企业，这样国家才能更好的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以此来规避一些风险，让整个国家的经济更高效率的运转。例如，在 2007 年到 2008 年这一段时间里，全球粮食的价格大幅波动，全球粮食危机导致粮食供应紧张，从而导致粮食价格有大幅上涨的趋势，在此情况下，中储粮迅速在中国市场上投放大量中央储备粮，稳定中国粮食供应，使中国粮食价格保持基本稳定。

国有企业是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的基础，只有不断办好国有企业，就能让中国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步伐更稳定、更踏实。从经济学和中国法律的角度，国有企业是保障全国人民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产。做好国有企业，保证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有利于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公平性。例如，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总量很大，

但是人口基数也很大，因而预备资金在全球属于相当低的。为了提高人均社会保障基金基数，目前采取划拨 10% 的国有资本填补社会保障基金，以确保社会保障的安全和公平性支出。又如，只有坚定地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国家才有强大的财力加强全国城乡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兼顾城乡公平和区域公平。国有企业建设了一大批民生工程，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每家每户通电等，不断的优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 4.3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消灭贫困人口是兼顾公平的经济性措施

贫富差距是中国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出台了許多致力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消灭贫困人口的政策。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较低，而低收入者比重较大。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形成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改变中国长期以来依靠净出口业务和政府投资来让经济增长的局面。扩大中等收入，还有利于带动民间个人投资，促进经济的增长。中等收入人群是中产阶层的初始阶段，而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国家也就可以平稳可持续发展。

中国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问题，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以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势头看，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持续增加，已基本避免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中下收入群体的致命打击。消灭贫困人口是国际性难题，是最广义兼顾公平的经济性措施。中国通过低保、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等措施，致力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及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的问题，使全国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国家高速经济发展的成果。

## 4.4 扶持、推动和完善公益组织的发展是兼顾公平的社会性措施

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少公益组织蓬勃发展，在扶贫、灾害、医疗、教育等救助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慈善事业中，中国主要突出在扶贫济困方面。在扶贫救助方面，中国不少的公益组织与政府的社会救助形成合力，实现功能上的互补，通过

捐款捐物、义演、义卖、义拍等多元的方式将富人的财富间接的转移到穷人的手中,起到了很好的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行动中,中国公益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新冠疫情初期,由于正好碰上中国的春节,中国许多工厂都放假,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医疗物资的产能严重不足,而一线医生、护士所需物资库存也马上用完,就是在这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马云公益基金会、韩红公益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医疗物资的货源,只要找到符合国家标准的医疗物资就马上发回中国,因为这些公益组织的积极行动,很大程度上缓解前线医生、护士的燃眉之急,保护了前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从而使得病人可以得到有效的救治。

当然现阶段中国公益组织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也爆出了武汉红十字会丑闻。为了公益组织健康可持续发展,能够更好地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政府大力支持和完善相关慈善机构,鼓励社会各界开展公益活动,并相应减免一定程度的税收;健全公益组织捐赠物资对接机制,规范捐赠及其管理行为;加强对公益组织的监管行为,规范使用捐赠物资和钱财,使捐赠信息透明化、公开化,防止公益组织内部出现贪污腐败的行为。完善公益组织,使国民财富再分配的效率得到提高,从而实现财富转移的合理、合法和公平公正。

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sup>[18]</sup>。综上,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扶持、推动和完善公益组织的发展,处理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N]. 人民日报, 2017-10-28:20.
- [2] 郭书田, 刘纯彬, 等. 失衡的中国 [M]. 河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 [3] 孙立平. 失衡: 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4] 李实, 岳希明. 《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5.
- [5]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张子源译. 不平等的代价 [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 [6]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M]. 巴曙松,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7]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8] 巫宝三. 管子经济思想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9] 郭威, 王声啸, 张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平观与效率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J]. 经济学家, 2018(10):32-38.
- [10] 卫兴华, 胡若痴. 近年来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不同解读和观点评析 [J]. 教学与研究, 2013(07):52-60.
- [11] 哈耶斯.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M]. 邓正来,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12]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166.
- [13] 邓小平.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J]. 党的文献, 1994(06):6-9.
- [1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118-119.
- [15] 习近平. 完善包括机会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EB/OL]. 人民网 (2018-01-30)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8/0130/c385476-29794931.html>.
- [16] 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EB/OL]. 中国新闻网 (2016-01-01)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1-01/7697573.shtml>.
- [17] 冯根福. 中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 攻克人类“公平与效率”难题的中国贡献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7 (06):1-6+122.
- [18]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 [EB/OL]. 求是网 (2019-11-01) [2019-12-09]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19-11/01/c\\_1125178982.htm](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19-11/01/c_1125178982.htm).